

近代以来日本宗教对话发展的政策性动因论析^{*}

陶金[◎]

内容提要: 受 1893 年万国宗教大会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日本的宗教团体已经出现了多宗教集会和研讨式对话模式。战争爆发后, 日本政府通过《宗教团体法》强制宗教团体集结, 以联盟集团形式开展对话与合作, 成为对内煽动和协助备战、对外宣教进而辅助战争的一种联合势力。日本战败后, 随着“政教分离”政策的实施, 日本政府通过邀请宗教代表集会等形式开展战争死难者慰灵活动, 成为现代日本共祈式宗教对话的最初形态。《宗教法人法》颁布以后, 地区性、全国性宗教联盟成为了日本宗教团体与政府的业务中转站和传声筒, 也成为现代日本各类宗教对话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宗教对话是映射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政教关系发展状况的一面镜子。从日本宗教对话发展史及其特异性的视角考察当代日本政教关系问题, 或可为日本乃至东亚宗教研究带来新的思考向度。

关键词: 日本宗教 宗教对话 政教关系

作者简介: 陶金, 哲学博士,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政治和宗教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和历史现象, 但在共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两者却在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关联性。在东亚国家中, 日本的政教关系问题尤为复杂, 日本宗教组织与政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葛由来已久。纵览日本社会发展史, 宗教与政治始终保持着隐性或显性的联系。2022 年 7 月 8 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街头发表演讲时遇袭身亡, 自民党和统一教的关系受到日本舆论强烈关注。8 月 10 日,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改组后的内阁正式启动, 他要求新内阁成员每人都必须检讨和报告自己与统一教的关系。可见在现代日本, 宗教团体与政治的关联性不但没有阻断, 反而缠绕更深。这些政治事件背后是单一宗教团体内部行为, 还是具有教团联合体支持背景, 都有待深入考察。

以考察单一宗教、教派的方式去探讨日本政教关系问题是常规的研究范式, 但着眼于日本各类宗教团体联盟与政治的关系展开的日本宗教研究不多。集团性是日本文化的特性之一。贴近政治、依附政权, 是日本宗教发展的典型特征。当宗教团体以集团形式集结, 形成宗教联盟, 就可能成为左右政权存续的强大力量。反之, 如果宗教联盟听命于政权, 就会成为一种隐形的社会凝聚力, 在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尤其典型。宗教联盟的组建、宗教对话活动的开展, 在不同历史时期, 成为了反映日本政教关系一种特殊形态。本文从广义的宗教对话^① 视角考察当代日本政策性因素对于宗教团体集结与开展对话活动的影响, 以期为本国政教关系研究略添新意。

^{*}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东亚视阈下日本宗教对话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 19BZJ008)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宗教对话”的定义, 参见陶金《会通与互鉴——池田大作文明对话思想研究》,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第 2—3 页。在本文中, “广义的宗教对话”包括多宗教、教派集会, 宗教联盟的组建与宗教间合作, 研讨式交流, 共祈、灵修等宗教活动。

一、万国宗教会议与日本参与世界宗教对话的肇始

历史上,1893年9月11日召开的万国宗教会议(The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是首次世界规模的宗教对话大会,东西方宗教的接触与对话由此拉开了帷幕。万国宗教会议本是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400周年而召集的万国博览会的分会议之一,以美国自由主义神学家为主导,基督教诸派、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神道、儒教等来自世界各地的41种宗教210名代表齐聚美国芝加哥,正装出席了会议。^①世界宗教大会将于1893年召开的消息,初见于明治24年(1891)日本传统佛教团体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结社组织“令知会”的月刊《令知会杂志》^②。日本成立了专门的咨询委员会,招募参加者。^③最后派出佛教代表释宗演、神道代表小崎弘道、基督教代表平井金三等参加会议。释宗演代表佛教在大会上做了发言,积极阐释了佛教的因果律,努力将佛教构建成为一种以释迦牟尼为信仰者、兼具时代性与合理性的近代新佛教。^④万国宗教会议也成为日本宗教团体参与世界宗教对话的肇始。

二、战前日本宗教对话的“民族中心主义”色彩

1. 日本“宗教家恳谈会”对“国家精神”的呼吁

出席万国宗教会议的释宗演等人回到日本后,开始着手酝酿在日本也召开类似的宗教大会。一方面,参会代表受到了大会倡导的和平与博爱精神鼓舞,也被世界宗教发展的状况所震撼,回国后广泛宣传会议盛况;另一方面,他们也从自身宗派和日本佛教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将世界宗教对话会议作为“佛教传播到西欧世界的机会”^⑤,希望日本佛教徒能率先开启宗教间对话与交流,让尚不为人所熟知的大乘佛教借此得到在欧美国家传播的机会,从而让日本佛教成为“世界宗教的重要支柱”^⑥。因此,由佛教团体率先倡导,决定召开日本“宗教家恳谈会”,会议主旨是希望能够消除宗教间的“壁垒”,为“人类博爱”而握手言和。^⑦在这次会议中,来自佛教、神道、基督教的代表和宗教学者姊崎正治等,分别进行了短时间的演讲,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谈和对话。对此,《反省杂志》报道如下:

(诸教)立于慈悲博爱之同根坦诚以见,携力共谋社会公益,教理教学诸事亦可倾听未闻之方面,一睹他教名士之风采仪表,其益可鉴。^⑧

这是日本首次举办类似于万国宗教会议的宗教对话会议,其中也提到了宗教的社会贡献等内容。但事实上,其背后也隐藏着日本佛教自身的政治诉求,即希望借此推动佛教在世界宗教舞台崭露头角,以此向当时日本政府和当权者彰显日本佛教作为“护国教”的正统性与重要性,而其中的“社会贡献”本质上也是为日本佛教传统的“护国”思想服务的。从佛教

① [日] 嵩满也:《シカゴバンコク宗教会議と明治初期の日本仏教界》,《国際社会文化研究所紀要》,2011年13号,第255页。

② [日] 晚潮道人:《日本仏教家の出品を望む》,《令知会雑誌》,1891年86号,第15页。

③ [日] 鈴木範久:《明治思想思潮の研究:宗教学事始》,東京大学出版,1979年,第208—209页。

④ 陶金:《日本当代佛教与世界宗教对话》,《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4期。

⑤ [日] 鈴木範久:《明治思想思潮の研究:宗教学事始》,東京大学出版1979年,第216页。

⑥ [日] 鈴木範久:《明治思想思潮の研究:宗教学事始》,東京大学出版1979年,第233页。

⑦ [日] 鈴木範久:《近代日本宗教協力小史》,竹内整一、月本昭男編《宗教と寛容:異宗教・異文化間の対話に向けて》,大明堂1993年,第31—52页。

⑧ 《反省雑誌》,中央公論社1986年,第68页。

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但基督教思想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传播重新抬头,神道思想也以日本民族的正统信仰示人,得到政府的庇护与扶持,势力大兴。在日本思想界,佛教势微,处于迫切希望得到认同,谋求自身发展与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期。通过参与、发起宗教对话活动,努力调整被动应对神道、基督教挑战的弱势地位,积极主动地推动佛教利用宗教对话的舞台向世界发声,这本身也是日本佛教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初步尝试。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看,19世纪晚期,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中心主义”^①思想的抬头,日本宗教界的论争日渐激烈。当然,这与历史上日本佛教和神道围绕孰为“护国教”问题、对抗与融合的发展历程不无关联。在本次会议中,大部分参加者都提及宗教和谐与宽容,但正如日本学者铃木范久所言:

凡宗教性会面,参加者常论和谐与宽容,但其和谐宽容之精神自有其边界。是介于不违国策之框架。对有违此框架之宗教或宗教者则一改其态度,以排他、非宽容之态度待之。^②

这里的所谓“国策”,是与日本明治维新后倡导“尊皇”的宗教权威政策密切相关的。与会者松村介石发表了“需培育国家精神与独立之气象”的演说,《反省杂志》对此评论说,“演说毫无宗教家应有之语气”,“势如排山倒海大声疾呼”^③。由此亦可推测当时会议现场的气氛充斥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激烈论调。

2. “日本宗教大会”关于社会时政问题的研讨

1924年“日本宗教家座谈会”成立,称其目的是“增进相互理解”与“围绕共同研究事项和时事问题交换意见”。1928年6月5日至8日,该会在明治神宫外苑的日本青年馆召开“日本宗教大会”,大会分为“和平部会”“教育部会”“社会部会”“思想部会”进行讨论。其中思想部会由姊崎正治担任会长,讨论“唯物思想与宗教”“政治与宗教”等问题。和平部会由新渡户稻造担任会长,讨论“国际教育”“不参战条约”“废除种族歧视”等问题。^④大会通过了《日本宗教大会宣言》,宣言强调“善导”社会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最高和最深刻的宗教信念”。

首先,大会宣言批判“唯物主义”,认为只有深刻的宗教精神才能“善导”社会。其表面是意于凸显宗教的存在感与社会责任,而其中隐含着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国际共产主义传播与发展趋势相关的时政原因。如前所述,万国宗教大会是万国博览会的分会议,博览会旨在展示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与科技生产力进步的成果,而万国宗教大会是宗教大规模集会,旨在向世人展示“圣灵的伟大世界”,其中就包含了与“唯物主义”“无宗教主义”相对抗的涵义。而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近邻中国的传播与蓬勃发展态势,对于日本政府战前宣传的“君权神授”皇统思想与日本民族中心主义思潮构成了冲击。大会对“善导”社会的宗教精神的强调与研讨,其内在隐含的也是对日本政府政策的一种导向和遵循。

但另一方面,从会议议题来看,“反战”“种族歧视”等广泛意义上的时政性话题也成为了该会议的主流议题。四大部会分别从和平、教育、社会、思想四个方面展开研讨,围绕社

① 许宁宁:《从神佛关系的逆转看日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萌生》,《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1期。

② [日]铃木范久:《近代日本宗教協力小史》,竹内整一·月本昭男編《宗教と寛容:異宗教・異文化間の対話に向けて》,大明堂1993年,第50页。

③ 《反省雜誌》,1986年9月,第69页。

④ [日]額田章友:《平和への道をめざして:WCRP先達の足跡》,世界宗教者平和會議日本委員会2011年。

会发展与公众事务展开对话，并未囿于宗教一隅，说明当时的日本社会，对于宗教集会与对话，尚存自由探讨社会问题的空间。国际教育问题、反战条约问题、废除种族歧视等对话议题，与时政相关且旨在谋求平等、公正的人类权益，正如长期致力于日本宗教对话活动的冈信一良在1981年的WCRP会议所言，此次日本宗教大会的主题是“时至今日依然可以探讨、具有生命力的主题”。^①

3. “日本宗教和平会议”对于和平重要性的强调

日本宗教大会后，1931年5月18日至20日召开了“日本宗教和平会议”，围绕宗教、伦理、博爱事业、大众文化等实际问题进行讨论。时任日本总理大臣的若槻礼次郎也出席了本次日本宗教和平会议。会议本身的议题是“宗教如何服务于人类？如何从人类社会中消灭惨烈的战争，世界如何获得永久和平？”^②会议宣言中可见下列陈述：

如若世界上全体宗教人士相互协作，最大限度去努力，那么无战争世界这一理想将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宗教信仰中，而且将成为真正的国际性事实。^③

从会议宣言可以看出，在战前的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的气息在弥散，宗教界已经敏锐感知到了这样的发展趋势。邀请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出席宗教和平会议，应该也有日本宗教希望通过国家官员的影响力来达成将宗教界对和平的期待和呼声传递给政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战前的日本，还是容许以宗教集会的形式探讨宗教协作、反战、和平等问题的。然而事实上，这样的集会被日本的右翼所厌弃，最终并没能持续举办下去。

从以上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宗教对话会议可见，万国宗教大会的会议精神与以宗教集会形式展开的宗教对话，对正处于近代化发展转型期的日本宗教，有着较强的感召力。日本宗教自古与国家政权紧密关联，政治性因素的影响力在各类宗教集会与对话活动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显现。从宗教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日本政治是日本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反之，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日本当代宗教也是日本宗教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④从战前日本的宗教对话情况来看，无论是谋求“护国”“正统”地位的彰显，还是对宗教“善导”精神的强调，或是对于宗教维护世界和平能力的讴歌，都是在国家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展开的对话。宗教对话犹如政治的反光镜，已经映射出了战前日本的政治发展动向。

三、战时体制下日本政府对宗教的整体管控和强制联合

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于宗教管控力度加强，各宗教团体正常的宗教活动常因战争和禁令而无法继续。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指令和调控下的宗教联合行动。

1. 战时体制下对宗教团体的整顿与合并

1939年日本通过了《宗教团体法》，这是在战时体制化情况下制定和实施的宗教管理法规。该法对宗教团体规模、宗教法人义务、宗教活动规章等进行了严苛的限制，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迫使日本宗教团体合并。首先，该法案对宗教团体的规模进行了规定，即每个宗教团体下设的教会、寺院等超过50个、且拥有信徒5000名以上才具备被认定为宗教团体的资格。在这样的

① 《WCRPの歴史：宗教協力による平和への実践》No.27，1981年2月，第7页。

② 《大本七〇年史》上，大本七十年史编纂会1964年，第89—90页。

③ Braybrooke, M., *Inter-Faith Organizations, 1893-1979: An Historical Directory* New York, Toront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0.

④ 张文良：《关于日本当代政教关系的若干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国家政策指令下，各宗教团体为自保，只能采取合并的方式增大自身教团规模。而通过这样的指令强制性要求各宗教团体进行整顿和合并后，按照《宗教团体法》，日本国内被认定为宗教团体仅有 43 个。同时，该法规第 4 条规定，宗教代表在就任时必须得到国家主管大臣的认可，所有宗教代表均被认定为“敕任官”，需承担“效忠服务天皇的身份”^①。按照这样的法令要求，宗教团体的设立、解散、宗教法人变更等都需得到行政许可，若有违反则将对传教、仪式等活动施加限制，或者直接取消宗教团体资格。另外，法令第 18 条规定“主管大臣对宗教团体进行监督，必要时需向其报告并接受调查”，这也表明宗教团体已完全被置于行政管理之下。

2. 政府强制发起的宗教联合运动

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文部省令各个宗教团体成立“战时宗教报国会”，为战争做好宗教服务。日本神道、佛教、基督教分别成立了“神道教派联合会”“大日本佛教联合会”“日本基督教联合会”。1943 年 9 月 30 日，三大联合会的代表联名发起了“财团法人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这是一个为战争合作而开展的宗教联络组织，其成立宗旨是“神、佛、基三大教团同心协力，与文部省形成内外合力，为宗教报国而奋勇迈进”^②。以此为开端，日本各地区也成立了“宗教报国会”，举全国宗教人士之力进行总动员、进行战争合作。

“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于 1943 年在全国都道府县成立了支部，除此之外，还针对投身于战时产业的国民开展了宗教教化运动，在战争灾难地成立回向挺身队，进行巡回祭奠，举行“胜利祈愿大法要”和“遗属慰安大会”，以及回收铝币和食品增产运动等。在战时体制和国家的强令要求下，日本的宗教团体不再是创造世界和平的“宗教”，而是以集团联盟的形式，“强制开展地区性的战争合作”。各宗教团体常规的“法事”“供养”等各类宗教资源，也被用于支援战场、振奋士气。

在战时体制下，日本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和建立法规的方式，强制性命令宗教团体大规模集结，并剥夺宗教团体的自主权，利用宗教团体力量和宗教思想的导向力，开展愚民教育和战争动员、物资筹集、心理干预等，让宗教以集团形式为政府发动的战争服务。这也让日本国民一度陷入狂热的战争状态之中，宗教团体联合后形成的大规模集团性、迷惑性、心理导向性的趋势，具有强大撼动力，易于形成战时状态下国民狂热心理攻势和防御阵容。

3. 政府强压政策下海外宗教对话：大本教“宗际化”对话

在战时宗教政策的强压下，日本政府除了对宗教团体开展集团式宗教管制，还对发布不利言论的宗教团体采取了强压式的手段。较知名的即是大本教“第一次弹压事件”。

(1) 大本教“第一次弹压事件”。大本教是日本神道系教团，创立于 1908 年。教祖出口王仁三郎坚持倡导“大正维新论”，批判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政策，认为国家一味地谋求财力和武力强大，会失去人生根本意义，导致弱肉强食，是误国之政，坚持强调人类爱善主义。随着大本教主多次预言的成真，其教团影响力不断提升，规模扩大。1921 年 2 月 12 日，日本京都府警察部藤沼庄平得到检事总长平沼骐一郎^③命令，以大本教是妄图“颠覆国家的阴谋团体”为名，带兵闯入大本教本部搜查，而后报纸等媒体竞相报道大本为国贼邪教，进而捣毁其宗教设施神殿。史称“大本教第一次弹压事件”。在这样的政府强压与取缔政策下，大本教开始转为对外联合，在海外寻求同道，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推进宗教间对话^④。大本在

① 《日本宗教連盟五十年のあゆみ》，日本宗教連盟五十周年実行委員会 1996 年，第 7 页。

② 《日本宗教連盟五十年のあゆみ》，日本宗教連盟五十周年実行委員会 1996 年，第 9 页。

③ 后担任日本首相，是日本历史上第 35 任首相。

④ 大本教内部称相关活动为“宗际化”。

立教之初也曾对其他宗教持排斥态度，但第一次大本事件以后，其态度发生了变化，表现出了强调各宗教“统一”的倾向。第二代教主出口すみ子明确表述：“神是平等的，佛与基督，其教之根本同一，传承人不同而已。大本不排斥他宗”，对“只认为自己信奉的教导是正确的，把其他宗教视为邪说”的倾向进行了“严厉的修正”。^①

(2) 与中国道院^②等的交流与对话。1922年，以大本教主出口すみ子与巴哈伊教的相遇为契机，大本与道院（中国）、普天教（韩国）、伊斯兰教开展了活跃的交流。特别是与道院的合作很深，持续到了现代。1925年5月20日，由大本教主导，以增进全人类福祉和社会繁荣为目的，在北京成立了“世界宗教联合会”^③。该会认为，宗教差异论争是由于尚未理解“宗祖本意”“宗祖真意”。世界宗教联合会可使宗教回归“各宗教之原初形态”，并称诸教通晓“宗祖本意”或“原初形态”，“地上天国即可显现，上帝之国即可显现”。^④

(3) “万教同根”对话理念的提出。大本教教主出口王仁三郎认为，为了世界人类的和平与幸福，“人心和睦是首要问题”，“这就必须以‘教’团结世界同胞”^⑤。也是源于“万教同根”的思想，在中国北京成立了世界宗教联合会。但实际召开会议时，各宗教的“宗教利己主义”非常强烈，“只主张自己宗教的优点”，世界宗教联合会也因根植于宗教内部的“排他性”而迎来了终结。大本教其后在日本成立了“人类爱善会”，但人类爱善会是大本内部的组织，并非宗教联合组织。在其宗旨书中，呼吁超越“人种”“国家”“宗教”的差异，回归“人类本来就是兄弟同胞”的“本义”^⑥。大本教基于宗教本质、回归宗教原初性的主张，反映了宗教间对话的目的，出口王仁三郎也正是通过“万教同根”论将大本教与其他各宗教的关系教义化。

虽非诸教皆同根，然其乃接受天命之天使现身各地以传教义。接受教义之人其器相疏……，故容受之度各异，则形态多样宗教由此而生。但其根乃谓爱，无爱则宗教难立。以其根源之爱相连带，则联合可成。^⑦

正如对马路人所指出的，“万教同根”思想强烈地带有“宗教统一”“宗教融合”的理念。^⑧“万教同根”思想也成为该教团战后积极投身宗教对话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而大本教受到日本政府压制后，开始与海外宗教团体开展合作与对话，寻求“同源性”的做法，也是日本政策性因素影响宗教团体发展形态的一种显现。

四、战后政教分离政策对宗教对话的影响

1. “日本宗教联盟”成立与战后联合慰灵活动

1945年日本战败，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于1945年12月15日颁布“神道

① 《大本七〇年史》上，大本七十年史编纂会1964年，第692页。

② 道院，1921年成立于中国山东，以圣先天老祖为主神，尊五教同源论，祭祀世界五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教主。

③ 《大本七〇年史》上，大本七十年史编纂会1964年，第768—769页。

④ 《神の国》第98号，1927年，第76—81页。

⑤ 《大本七〇年史》上，大本七十年史编纂会1964年，第767页。

⑥ 《大本七〇年史》上，大本七十年史编纂会1964年，第772页。

⑦ 《大本教学》第17号，1978年，第16页。

⑧ 对马路人：《新宗教における〈万教同根〉思想と宗教協力運動の展開：戦前期大本教の事例》，中央学術研究所（編）《宗教間の協調と葛藤》，佼成出版会1989年，第283页。

指令”，明确政教分离的原则，取消神道教享有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特权。1946年，新的《日本国宪法》颁布，宪法相关条文贯彻了政教分离原则和保障信仰自由的精神。如第二十条“对于任何人，均保障其信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均不得享受来自国家的特权，或者行使政治上的权力。任何人均不得被强制要求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活动。国家及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或其它任何宗教活动”。^①但事实上，直到1946年，日本国内的宗教工作仍然由政府掌控，其方式也是通过管理宗教联盟。战争期间的宗教联合组织“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解散，成立了“日本宗教会”，会长仍然由国家文部大臣担任。直到1946年5月20日，日本宗教会在理事会上宣布解散，将名称变更为“日本宗教联盟”，强调“全面脱离政府的统治，以纯粹宗教团体的意志重新成立”^②，并宣称该联盟建设目的“为建设基于道义的文化日本，为确立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强调了与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的性质不同。这一组织迅速得到日本神道、佛教、基督教团体三方面的支持，“神社本厅”“佛教联合会”“教派神道联合会”“日本基督教联合会”加入其中。^③

战后初期，日本宗教联盟成为了在政府和宗教团体之间发挥联络、中转作用的机构。而该机构与海外阵亡者祭奠委员会和日本遗属会一起举办的“联合祭奠”活动等，则成为战后日本政府为回避与宗教团体直接接触而采取的一种折衷策略。战后日本实行了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严禁任何宗教在公开场合进行宗教仪式。为此，日本政府出面收集的阵亡人员骨灰，采取多宗教“联合祭奠”的形式开展“慰灵”活动。日本宗教联盟等宗教联合组织受邀到现场宣读“追悼辞”和“献花”，各宗教代表进行了简单的慰灵仪式，如神式的“修祓”、教派神道的“祭词奏上”、基督教的“圣经朗读”、神社本厅·明治神宫的“祭词奏上”“玉串奉奠”，由新宗教代表宣读“悼词”、佛教“诵经”等。以各色宗教粉墨登场的形式开展慰灵活动，让日本的各宗教以自由民主的集团性、平等性示人，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单一宗教的显示度。这种宗教联合的形式，成为战后初期诸宗教联合开展活动的一个典型范式。从政府主导宗教，到政教分离政策的推行，以宗教联盟的形式组织开展共同活动，这样的“宗教对话”成为了日本战后宗教对话“脱政治化”的过渡期形态。

2.《宗教法人法》引发的“宗教热潮”

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日本，由于战前日本政府利用国家神道、天皇权威对国民情绪的煽动以及战争期间利用宗教对国民意识的掌控，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中负责宗教问题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宗教事务科认为“政教分离”对日本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特别是宗教事务主任威廉·肯·邦斯(W·Kenneth·Bunce)，特别重视“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在日本推行了美国式的“政教分离”，即“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强力推进政府和神社神道的分离。“他认为应该保证个别宗教者或宗教团体的完全平等和自由”^④。1945年12月28日，日本废除了《宗教团体法》，当天公布了《宗教法人令》。按照法令要求，无论任何人，只要制定规则并进行登记，都可以设立宗教法人，宗教信仰自由，不需要政府的认可。这个反映了“彻底的信教自由精神的敕令”^⑤取消了对于民间宗教团体资质的限制，日本国内

① 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

② 《日本宗教連盟五十年のあゆみ》，日本宗教連盟五十周年実行委員会1996年，第20页。

③ 后成立的“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于1952年加入该组织。

④ [日]古贺和则：《宗教制度の改編過程：宗教行政を中心として》，井門富二夫編《占領と日本宗教》，未来社1993年，第209页。

⑤ [日]岸本英夫：《嵐の中の神社神道》，新日本宗教団体連合会《戦後宗教回想録》，新日本宗教団体連合会調査室，1963年，第232页。

各类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不被认可的“新宗教”团体取得了法人资格，很多宗教团体脱离了原有的组织独立出来成为法人，日本全国掀起了“宗教热潮”。

“信教自由”政策的执行，放宽了对于宗教的管制，但随着盟军撤出日本，日本作为独立国家重新发展起来等形势变化，宗教法人的认定与管理等问题开始凸显。由于各类新宗教团体、新新宗教团体的涌现，日本宗教界也提出了建立新的宗教法制法规的意见。为了制定《宗教法人法》，1949年，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文部省和日本宗教联盟成立了“宗教事务联络会”，就法制上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谈判。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宗教联盟是作为民间团体加入其中的，也是尊重宗教界意见的一种议政方式。1951年4月3日，《宗教法人法》颁布，宗教法人设立制度，由“备案制”改为“认证制”。由此，过去只需要制定规则、登记就被认可为宗教法人的，现在要附加各种条件，宗教法人的登记变得复杂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宗教间对话组织应运而生。如果说，战时的《宗教团体法》催生了日本的宗教团体联盟，那么，战后的《宗教法人法》则再次以行政指令和规程的方式促生了多样化的宗教对话组织，作为政教联络站发挥作用。

3. 行政与宗教的联络站：地区性、全国性宗教间对话组织的产生

(1) 石川县宗教联盟

石川县在日本宗教联盟成立后，于1946年成立了“石川县宗教联盟”。这是石川县内各宗教间的联络组织。与日本宗教联盟一样，作为行政与宗教间的联络协调机关运作。《宗教法人法》实施后，宗教团体把文件交到县厅^①，必须要通过石川县宗教联盟转交，无论宗教团体是否愿意通过这种联盟机构中转。由于政府不会直接与宗教团体接洽业务，因此必须依靠这种地区性的宗教联盟机构完成。《宗教法人法》在日本各地方自治体的施行，当地的宗教联盟发挥了窗口作用。以“石川县宗教联盟”为例，作为该联盟组织的宗教间对话活动，1952年召开了“石川县宗教联盟”创建“五周年大会”，针对会员开办了专题讲座，代表们学习和讨论的主题为“法律、宗教和社会”。这样的地区性宗教联盟发起的以“不熟悉法律和事务性事务的宗教人士”为主要参加者的对话活动，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在日本社会中，区域性宗教联盟是管理宗教团体所必需的组织机构。^②

(2) 群馬县宗教联络协议会

区域性宗教对话组织的另一个代表案例即是日本群馬县宗教联络协议会的成立。1955年，在群馬县政府的指导下，由县内包括宗教法人在内的宗教团体代表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群馬县宗教团体联络协议会。自《宗教法人法》开始实施起，各宗教团体成为宗教法人，以法人身份运营宗教事务，每个法人都要承担权利和义务。《宗教法人法》的执行是该协议会成立的原因之一，其主要活动是“接受县文教和外事科的《宗教法人法》事务指导^③，以宗教法人的正确运营为目标，各宗教团体密切联系并开展活动^④”。“石川县宗教联盟”“群馬县宗教联络协议会”等，都是区域性、地方性的宗教联盟和对话组织，在今日日本仍在发挥由“教”到“政”、由“政”到“教”的中转站作用。

(3) 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的成立

战后日本，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给宗教发展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土壤。20世纪

① “县”在日本的行政区划里相当于中国的“省”。

② 《新宗教新聞》第138号，1952年6月20日，第一版。

③ 此外还包含包含《宗教法人法》的解释和预备文件的确认等。

④ 群馬県宗教団体連合会記念誌編集委員会2014年，第18页。

50年代，五花八门的新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一度达到2000多个，重要团体达300多个，其中信徒在10万人以上的教团达到60多个。^①新宗教法人的认定与组织管理，成为日本政教关系中特殊且棘手的问题。1951年《宗教法人法》颁布以后，宗教法人需得到法律认证，这就导致行政无法割裂与宗教的关联性，“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政策很难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发挥宗教联盟组织政教中转站作用，达成政教沟通，促进各地宗教法人之间的合作，无论是从行政方面还是从宗教法人方面都变得十分必要。但需提及的是，新日本宗教团体连合会作为新宗教的联盟性组织，其成立则呈现出不一样的侧面，并非依赖国家或省厅指令来创建，而是采取了听从建议、自由加盟的方式。

新日本宗教团体连合会是源于盟军最高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宗教文化资源科的威廉·帕森斯·伍特德（W.P.Woodard）对完美自由教^②教主御木德近等人的提议“新宗教也应该成立一个连合会。”^③。据新日本宗教团体连合会第一任事务局长大石秀典回忆，威廉对御木理事长给与了如下建议：

战后虽有新宪法，获得了信教自由，但日本这个国家，或许还会右倾，有可能再次开始宗教镇压。到时新宗教恐怕依然会成为镇压的对象。如果像战前的“ひとのみち教团”和大本教那样孤立、各自为政的话，是不可能与国家权力抗衡的。因此，今后新宗教也必须携手，团结协作，共同对抗。^④

1951年，新日本宗教团体连合会成立，第一任理事长为御木德近，采取了新宗教团体自愿加盟的方式运营，以“坚守信教自由、推进宗教合作、献身世界和平”为口号，目前加盟教团共计70个^⑤，下设北海道总支部、东北总支部、首都圈总支部、近畿总支部、九州总支部等11大部会，从国家到地方，再延伸到下设的各级地区机构。正如新宗连成立初衷一样，新宗连坚持信教自由，保持了较高的政治敏感性，也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活跃于日本宗教对话舞台的重要力量。^⑥

4. 战争反省与宗教对话的回归

1954年4月3日“世界宗教会议”召开，该会议由大本教分离出来的新教派“三五教”发起，是邀请多国宗教人士加盟的世界性宗教对话大会。1954年到1956年期间共召开8次会议。会议议题是：“宗教人士如何看待当今世界”“宗教家如何引导人类”“宗教家的教义以什么为基础”“如何理解恶灵、邪灵、妖魅灵在灵界的活跃”“万教归一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方法”“宗教家对世界和平应作何贡献”“宗教家如何区分迷信与正信”“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如何看待救世主的出现”“其他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等。

1955年8月1日“宗教世界会议”召开，该会议由日本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发起，与上述“世界宗教会议”的不同点在于参加者身份的扩大化。世界宗教会议仅限国内外宗教人士参加，而宗教世界会议，和平运动人士、思想家、学者都受邀参会，并向政治家发送了邀请，是扩大的宗教对话会议。会议也不是讨论“宗教本身”，而是“从宗教的角度讨论当今

① 邵宏伟：《浅析日本新宗教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学刊》2008年第6期。

② 日本PL教团的前身。

③ 新宗連調査室，1963年，第174页。

④ [日]大石秀典：《大石秀典宗教論抄：真生滔々》，新宗教新聞社1983年。

⑤ 数字来源于新日本宗教团体连合会网页，网址为：<http://www.shinshuren.or.jp>。

⑥ 陶金：《当代日本佛教与世界宗教对话》，《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4期。

世界所面临的紧急问题”。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讨论：①各宗教的相互理解；②宗教与和平；③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会议上通过的《宣言》正式提出了宗教人士的“反省”和“责任”问题。

从上述议题可以看出，在日本社会开始转向国家复建和经济复苏阶段时，宗教以集团力量抵触政治力量对宗教的干预，宗教对话活动也逐渐开始回归初心，向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对话”缓慢转型。特别是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立正佼成会会长庭野日敬等大力推动宗教间的合作与对话，协作式、研讨式、共祈式、灵修式对话都成为现代日本宗教对话活动的主要类型。与此同时，另一种更扩大意义上的对话形式“文明间对话”论也由日本新佛教团体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提出。^①创价学会作为日本最大的新佛教团体，与日本公明党存在着较深刻的母体渊源，之所以将对话活动的重心放在文明间对话，较少与其他宗教联合，不参与新宗连等发起的宗教对话活动，除了其教团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纠葛外，如何看待政治因素与池田大作文明间对话活动的关联性问题，亦有较开阔的探讨空间。

五、结语：日本宗教对话发展的政策性动因分析

首先，政治是促成和推动日本宗教对话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日本社会，自古宗教就与政治密切相关，到了近代，各种历史际遇和政策方针促成了日本宗教的集结与对话。宗教对话也曾被政府利用，以宗教团体合作、集团联盟的形式为政治服务。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宗教集团势力甚至成为了政治的帮凶。战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意识的发展，宗教团体抵触政治干预，但又无法完全切割与政治的关系。地区性、全国性的宗教联盟是政教事务中转站，在促成公益性合作、国际交流等方面也在发挥作用。

其次，宗教对话可以为考察日本政治、解读政教关系问题提供新视角。立足不同的时代背景考察日本宗教对话，可以发现无论是唯物论和物质主义的兴起还是战争、灾害、政治形势的变化等重大社会变动，在宗教层面发生反应时，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宗教集结与对话。日本的宗教对话，反映的是宗教联盟与政治的关系。宗教对话体现出宗教团体的共性，其间映射出的政治形态，要比单一宗教显影更加鲜明。因此，在考察现代日本的宗教现象、政教关系问题时，从宗教对话的视角，考察同一宗教不同教派间的、不同宗教间的合力与张力，或许会为我们观察日本政治发展动向、解读政治现象和问题提供新的思考向度。

最后，日本宗教团体的对话因其政教关系渊源具有特殊性，值得密切关注。长期以来，日本的政教关系与历史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纠缠在一起，而宗教联盟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表面上让日本政教关系呈现出流程化、事务化的样貌，事实上却让日本的政教关系问题更加复杂和隐秘。纵览日本宗教对话发展史，宗教对话是一把双刃剑，向社会公益方向发展可以福利大众、捍卫世界和平与发展，但若被政治操控，则存在离经叛道的风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宗教关系、宗教对话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日本政治可以为日本政治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反之，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日本历史上的宗教联盟、宗教对话问题也将成为日本宗教学研究的新突破口。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陶金：《池田大作“人间论”对话思想中的东方佛学理念探源》，《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1期。